

空间实践视域下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的建构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调查

郭旭东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立足易地扶贫搬迁和后续扶持,从空间实践视域关注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边界建构的内在机理和制度逻辑。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的建构依照“政府—移民”双向实践路径,通过建构和反身建构的实践形式来感受空间,双方由此调整实践策略,形塑移民空间的结构特征。基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国家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建构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支配权、控制权,通过空间整合、空间支配、空间调整的形式,不仅决定了移民生活空间的策略性选择,而且对移民日常生活的常规要素进行必要指引。身为实践主体的移民虽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在持久稳定的行为倾向系统的前提下,依据过往实践活动的结构指引,以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和惯习的方式开展实践行为,自下而上地形塑移民生活空间的边界。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研究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能够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建构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移民生活空间;空间实践;“国家—社会”;边界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25)01-0056-12

DOI:10.14045/j.cnki.nmsx.2025.01.008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与主要问题

虽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在一些生态环境恶劣、缺乏生存条件的贫困地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成为实践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计划》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发展问题”^①，“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通过‘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从根本上解决约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②,切实补齐民生短板。“易地搬迁是党中央脱贫攻坚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③,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贯彻落实党中央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作者简介]郭旭东,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2017年5月16日,见https://www.ndrc.gov.cn/fggz/fzllgh/gjjzxgh/201705/t20170516_1196764.html。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2017年5月16日,见https://www.ndrc.gov.cn/fggz/fzllgh/gjjzxgh/201705/t20170516_1196764.html。

③苗静、史俊宏、夏雨甜:《产业扶贫政策对易地搬迁农牧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财经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的重要指示精神,需要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需要同步搬迁的居民实施易地搬迁。

郑娜娜、许佳君在《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一文中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内嵌于一定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框架”^①。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提出了现代性的挑战,随着居住地点的变化,“‘家’的流动性打破了其固着的社会网络和情感意象。”^②移民搬离原居住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样态均发生变化,公开移民新群体的身份,意味着原有社会关系逐渐剥离和断裂。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作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首先,基于社会适应角度,彭莫、张兆函、莫扬在《宁夏西海固回族扶贫搬迁移民的生存适应》一文中认为:“扶贫搬迁移民在迁入新的居住地之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思想观念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处于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之中。”^③其次,基于文化适应角度,王思汭在《灾难移民的心态、记忆与适应现状——基于中尼边境樟木夏尔巴人的研究》一文中认为:灾难移民群体在“社会心态、社会记忆”^④等方面“与移居社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矛盾与困境”^⑤。最后,基于心理适应角度,史梦薇、王炳江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心理适应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一文中认为:“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在搬迁后面临经济、文化、心理等一系列的社会适应过程,其中心理适应是推动移民社会适应的重要力量。”^⑥

伴随着社会学研究从“结构论”向动态“结构化”的理论转向,空间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当今学者的关注。许斌、周智生在《西南边疆地区山地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分异与演变研究——基于桂西德峨镇的个案研究》一文中认为:“地理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发展与空间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在从‘人—地关系’转向‘人—社会关系’”^⑦。易地扶贫搬迁导致的空间变动,不仅意味着客观物理空间的变动,而且是社会性空间和主观性空间的变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日常生活的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指出:空间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组关系形态,是它们之间交往联系及社会实践的连接^⑧。空间形态和空间行为的演化发展,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而且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变量作用的产物。生活空间是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场域,实践主体在建构移民生活空间的过程中不断诠释空间、在空间实践中感受空间。移民空间的建构是“时空分离”作为现代性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中“脱域”,在社会机制和社会经验逐渐内化于实践主体的前提下,从“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⑨使用和理解空间。

国内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蕴含的空间隐喻,从而基于空间视角来分析移民空间实践并且进行多角度的框架解释。这些学者具有两种典型的研究思路。第一种典型的研究思路是在移民空间内对移民实践主体的形象解构。首先,学界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研究身份作为持续演变过程中被不断建构

①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②薛熙明:《灾后异地移民“家”的空间变迁、认同及调适——基于对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某移民村寨的调查》,《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③彭莫、张兆函、莫扬:《宁夏西海固回族扶贫搬迁移民的生存适应》,《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④王思汭:《灾难移民的心态、记忆与适应现状——基于中尼边境樟木夏尔巴人的研究》,《民族学刊》2020年第9期。

⑤王思汭:《灾难移民的心态、记忆与适应现状——基于中尼边境樟木夏尔巴人的研究》,《民族学刊》2020年第9期。

⑥史梦薇、王炳江:《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心理适应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⑦许斌、周智生:《西南边疆地区山地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分异与演变研究——基于桂西德峨镇的个案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

⑧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p.116.

⑨[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的内容,与移民身份相关的社会维持是以何种方式建构并且加以确认^①。其次,学界关注对移民生计方式的研究。在移民生计资本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部分家庭缺乏后续产业的发展动力^②。学者们认识到,移民空间的生计再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而在现代性发展的层面审视移民生计方式下的空间态势,以整合路径构建可持续空间域^③。第二种典型的思路是对移民空间的分异格局进行研究。首先,基于物理空间的分异样态而言,移民空间呈现块状聚集(远郊区呈现分散分布)的规律^④。其次,学者们从社会文化的传统意义出发,研究根据个人的认知和惯习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构建的社会空间概念以及基于国家权威框架下的空间更新形成的边界意识^⑤。

以上两种典型的思路对移民空间内的空间实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学者们依托对移民空间内身份认同和分异格局的探知,能够对空间内部的结构、实体与空间内部的关系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对空间实践的研究打破了结构论视域下的功能分区和社会结构分析范式,将注意力集中于受移民空间影响的个人和集体,有助于把握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者们虽然认识到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的形成涉及政策支持、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等层面,但是在针对空间实践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注重移民主体在移民空间内的空间实践过程,将“框架内的国家”这一重要角色排除在空间实践的研究之外,无法对移民生活空间形成总体性、全面性的认识。事实上,移民空间系统的结构性特征依靠“政府—移民”的双向“空间实践”,通过建构与反身建构的实践形式来感受空间,政府和移民由此调整实践策略,形塑移民空间的边界结构特征。“框架内的国家”如何在移民生活空间开展实践,是学界需要拓展研究的方向。笔者认为,实践主体在移民生活空间内的体验过程塑造着空间的内部边界,“框架内的国家”也在权力下沉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空间治理策略。

笔者着眼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及后续扶持措施,从空间实践视域关注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边界的建构过程,阐述这一社会现象蕴含的深层次机制。将空间实践视域置于“国家—社会”双向反身建构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不仅能够较为完整地把握移民生活空间发生的变动,而且可以对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二)案例及研究方法

笔者采取定性研究方法,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扶贫搬迁的地方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辖2市、9旗,2023年年末全盟户籍人口为104.15万人^⑥。“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⑦李俊伟在《锡林郭勒盟治沙治出实在效益》一文中提到:“2000年~2014年的14年间,锡林郭勒盟整体实施的生态移民达到49 283人。”^⑧多年来,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来实现地方生产经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成为锡林郭勒盟乃至内蒙古自治区每年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总体而言,锡林郭勒盟易地扶贫搬迁的规模、形式、社区重建、后续扶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案例,是研究可持续发展和政策干预效果的重要场所。笔者以“框架内的国家”和“移民实践主体”两个方向作为空间实践的两条路径,通过对空间变动和空间调整的把握,依托政府文件、文

①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2007年第6期。

②束锡红、聂君、樊晔:《精准扶贫视域下宁夏生态移民生计方式变迁与多元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③冯雪红:《藏族生态移民的生计差异与社会适应——来自玉树查拉沟社区的田野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④肖扬:《全球城市视角下上海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研究》,《城市规划》2016年第3期。

⑤袁超:《文化资本与空间分化:城中村流动人口消费空间隔离的再生产》,《湖湘论坛》2019年第9期。

⑥锡林郭勒盟统计局编:《2024年锡林郭勒盟数据要情手册》,第22页。

⑦杨凌云:《内蒙古实施“围封转移”战略 草场得以休养生息》,2005年12月11日,见https://www.gov.cn/gzdt/2005-12/11/content_123932.htm。

⑧李俊伟:《锡林郭勒盟治沙治出实在效益》,《中国环境报》2015年10月13日第6版。

献资料和在部分易地搬迁社区进行走访调查,以他者的视角感受由传统向现代性过渡的空间协变,尝试从物理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协变中阐释移民生活空间的建构逻辑。

二、政府动员型移民生活空间的诞生

(一)“扶贫”话语的提出及组织实施

易地扶贫移民搬迁作为一项惠民政策,通常以文本的方式呈现。与文本相比,话语具有互动性、情感传达、记忆促进等亮点。通过话语,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文本内容可以更加生动和易于理解。施旭在《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一书中认为,话语“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事件或这样一类现象”^①,话语可以调节内部成员的利益关系以实现既定目标^②。作为人们日常交往和交流的言语形式,在移民搬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话语是政府部门重要的信息输出工具。锡林郭勒盟移民搬迁积累了多年的地方实践,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通过文本的构建实现了牧民对易地移民搬迁政策的认可,以话语向行动转化的形式实现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的建构。

第一,蓝图设计。为了顺利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国家制定了公共政策话语并且予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计划》提出:“以建档立卡搬迁人口为扶持对象,立足安置区资源禀赋,依据不同搬迁模式,通过统筹整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相关涉农资金,支持发展特色农牧业、劳务经济、现代服务业等,探索资产收益扶贫等方式,确保实现稳定脱贫。”^③国家层面希望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致富的双赢;依托“政府主导型反贫困政策”的易地扶贫搬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了强调移民搬迁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特别注重“生态”和“扶贫”的话语表达,通过建设移民生活空间,将合法性动员与国家权威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组织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向中小城镇、工业园区移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能力。”^④中国共产党锡林郭勒盟委员会、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以项目为载体,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为目标,设立扶贫开发重点项目,加强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根据各级财政扶贫资金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在搬迁动员工作方面,有些牧民抱有安土重迁的思想,或者在经济利益的角度不愿意搬迁;地方政府通过话语权威,将移居后的空间描述为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场所。政府以权威话语作为信誉保证,当牧民认同易地移民搬迁的文本和话语后,政府与牧民达成趋同利益,从而顺利开展易地移民搬迁工作。

(二)移民生活空间的生成

锡林郭勒盟是边疆民族地区,尚未改变欠发达的区情,在一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牧民的人均草场面积有限,收入来源单一。受地区发展不均衡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牧民因灾致贫现象时有发生。为有效应对脱贫攻坚面临的挑战,政府部门充分考量当地水资源情况、城镇化水平、居民搬迁意愿,采取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安置方式。

第一,行政嘎查村就近安置。

锡林郭勒盟通过“分散插画式”引导本行政嘎查村的牧民就近安置到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较好、公共服

^①施旭著:《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李雪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政策话语研究——基于语用学理论的分析视角》,《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年第9期。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2017年5月16日,见https://www.ndrc.gov.cn/fggz/fzllgh/gjjzxgh/201705/t20170516_1196764.html。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2020年9月5日,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务设施较为完善、环境承载能力满足安置条件的嘎查村。例如,2016年“苏尼特右旗总投资1 300万元实施了自然村整合与易地扶贫整村搬迁脱贫工程”^①。“该旗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决定将朱日和镇原新乡列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地,把当地的5个行政村中的38个自然村整合成19个自然村,对原先居住在这些生存条件恶劣、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自然村人口”^②实施易地搬迁,切实帮助搬迁人口摆脱生产生活等困境。

第二,新建移民嘎查村(社区)进行安置。

政府多部门联动,依托新开垦的或者调整使用的土地,将居住在草场沙化退化严重区域的牧民统一搬迁到规划建设好的嘎查村。相关部门为搬迁牧民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帮助他们采取新的生计方式。在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环境、市场需求、生态牧业等因素的影响下,牧民生产经营方式大多变为“舍饲养牛”。舍饲养牛是指将牛饲养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牛舍内,将产出的牛奶售卖给附近奶站以获取利润,实现了生产经营方式由“传统粗放放牧方式”向“集约生产方式”的转变。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欣康村、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柴达木社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来镇敖力克嘎查,居民的生产经营模式都是当地人民政府积极推广的舍饲养牛模式。

第三,依托小城镇或者工业园区进行安置。

锡林郭勒盟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针对居住环境恶劣、生存条件受限、具备劳动能力的建档贫困立卡户,在小城镇和工业园附近规划并且建设了集中安置区,以便提高易地搬迁人口的社会融入能力和经济自立能力。在实施易地搬迁时,牧民享受同步搬迁的有关政策,原则上以宅基地置换住房。苏尼特右旗在国家框架内坚持承包责任制和牧业户口不变的原则,将周边生态环境恶劣、经营方式单一的牧民统一安置到赛汉塔拉镇马兰小区居住。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通过出台稳定的就业补贴政策,来引导进城牧民多渠道就业,积极推动就业扶贫。

第四,依托乡村旅游区进行安置。

锡林郭勒盟引导周边不具备生存条件地区的搬迁户适度集中居住,立足于搬迁地的自然景观,挖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精心规划并且打造以旅游为特色的重点嘎查村;通过推广休闲旅游与文化融合相结合的乡村旅游模式,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和搬迁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来镇伊和塔拉嘎查积极打造“浑善达克风情小镇”,大力发展旅游业,打造正蓝旗影响较大的乡村旅游示范嘎查村。

三、移民空间边界建构的空间实践

(一)基于移民主体视角的空间实践

第一,物理空间的变动:空间语义与生产生活的嬗变。

从狭义的定义来看,物理空间就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功能而提供的建筑环境,是人们的基本生活要素之一。人们对物理空间产生了更深刻的指涉表达,物理空间的布局影响着人们的内心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动向,物理空间已经不仅仅指涉物理的含义。张纯刚在博士学位论文《筑与居:震后居住空间的建构》中认为,物理空间虽然是基于自然物质的存在形式,但是与社会领域接触之后,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凝固不变、空洞的容器,只是客观、绝对的框架”^③,人们应当把它视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物理空间。

首先,物理空间的变动,意味着个人空间的变动。住宅作为物理空间的具象形式,通常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紧密关联,具有地域文化特征和民族特征。笔者考察了锡林郭勒盟多个移民嘎查村的空间布

^①孙智广:《苏尼特右旗 易地扶贫搬迁让300人挪出“穷窝”》,2016年9月6日,见<http://www.northnews.cn/news/2016/0906/1449957.html>。

^②孙智广:《苏尼特右旗 易地扶贫搬迁让300人挪出“穷窝”》,2016年9月6日,见<http://www.northnews.cn/news/2016/0906/1449957.html>。

^③张纯刚:《筑与居:震后居住空间的建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14年,第112页。

局,发现易地搬迁安置房具有相同的混凝土结构、相似的房屋样式和外墙装饰,影响牧民的空间领域体验。从私密性而言,牧民曾经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在地广人稀的大草原,如今的集中居住虽然缩短了牧民之间的居住距离,但是物理空间的变动影响了牧民的社交距离。从空间视觉的角度来看,传统物理空间的历史意蕴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而逐渐消亡。物理空间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空间的装饰和布局记录着历史的故事、社会结构、文化特征。从视觉体验的角度来看,传统物理空间表达的民族、历史等文化元素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落实而逐渐衰弱。

其次,物理空间的变动,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变动。与农业区域相比,传统牧区的公共空间具有独特的亮点。一方面,牧民在易地搬迁之前的公共空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特征,并且与自然环境紧密关联。例如,聚集性强、流动性大的那达慕大会不仅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竞技活动,而且是彰显民族精神的公共文化表达。另一方面,牧民易地搬迁之前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是非正式的、随机的、模糊不清的。易地搬迁之前的公共空间分布于嘎查村的各个领域,随着政府对牧民的易地集体安置,新的公共空间具有新的表征含义,公共空间逐渐从流动到固定、从模糊到清晰,继而影响了移民的公共社交和公共文化的表达。

最后,物理空间的变动,意味着生产实践的改变。牧民搬迁到新的安置地点,会面临不同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这要求牧民必须调整生产实践以适应新的环境。面对牧民生产技艺和地方性知识需要更新的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产业发展策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适配的空间载体。“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①例如,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哈毕日噶镇后半台村“加强理论引导、保障机制建设、凝聚多元主体、营造文化氛围和增强科技力量赋能”^②,改变原有的粗放式畜牧业,发展促进奶产业规模化的舍饲养牛养殖业。部分牧民被安置到城镇之中从事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相关部门为移民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帮助牧民找到适合的工作。政府通过空间生产的方式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利用地理空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布局产业,继而提升生产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第二,社会空间的变动:社会秩序的重置。

社会秩序是社会成员在相互关系中遵循的行为准则,作用是确保在社会实践中保持日常生活的和谐与稳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启发式地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解读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③基于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解可以延伸阐释,牧民和农民都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世代生活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之中,揭示了牧民和草场之间的静态关系。无论是以农耕为根基还是以游牧为根基,人情关系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情社会强调以血缘、业缘为核心,以家族为纽带,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人情作为以熟悉和亲密关系为前提的社会单元,通过功能满足、社会控制、价值生产等形式完成社会秩序的价值整合^④。从这个意义来看,依照熟人社会的实践逻辑,是牧民世代生活相契合的历史凝结。

锡林郭勒盟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为一项脱贫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措施,会对以游牧为根基的熟人社会产生显著影响。首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易地扶贫搬迁使居民搬离世代熟悉的环境,以“就近安置”“建设新移民村”“市镇安置”的形式打破了原有的空间平衡。长期以来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组织形式被瓦解,由同质性熟人社会变为异质性陌生人社会。集中居住虽然缩短了牧民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造成了社会成员情感疏离。其次,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目的是脱贫致富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

^①杨妍、李海晶:《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依据、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

^②张会庆、蒋雯慧:《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教育精准扶贫协同共进的理路研究》,《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

^③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④杜鹏:《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是工作重点。在后移民时代,构建现代牧业体系成为主要的发展重点。家庭牧场和新型牧民生产合作社的推广,意味着移民的生产经营形式从以往的粗放型向集约化的科层制转型。科层制的管理体制通过强调规则和程序,减少了人情在决策中的影响,从工作关系的角度推动了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

第三,意义空间的变动:认同机制的重塑。

意义空间体现了个体或者群体在特定的空间内赋予的意义、价值、情感的过程。锡林郭勒盟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惠民工程,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来到新的居住环境,适应程度必然受到认同强度的影响,这种认同强度深刻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对空间的意义感知。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一书中,将“认同”定义为个人或者群体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趋同^①。李燕燕和刘志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认同”是个人或者群体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心理趋同,“审视关于自我的深层认知问题,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将归属哪里?’等。”^②

首先,草场承包政策影响移民对新居所的空间认同。笔者通过走访得知,根据锡林郭勒盟的户籍政策,牧民的户籍在易地搬迁之后必须迁往安置地。在划分移民搬迁户的草场承包经营权和承包经营权时,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切实保护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迁出地的草场承包经营权、各类农业牧业补贴、生态补偿等权益,确保他们在搬迁后的草场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且长期不变。依托现有的草场承包政策,易地搬迁的移民与迁出地的生活空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和归属感,削弱了移民对迁入地的空间认同感。

其次,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移民的认同拒斥困境。在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部分人口被政府安置在城市居住,基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现有的户籍制度建构了“农民工”的身份类别。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携带“搬迁户”的身份,与当地人的社会身份形成对照,对参照群体产生疏远、隔阂、不信任感,削弱了对迁入地的空间认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他们一方面缺乏相关的技术技能,在传统社会积累的惯习难以适应城市的工作节奏;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或多或少抱有拒斥情绪,造成参照群体之间的社会疏离,继而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了所属群体内部的认同感。

最后,实际的空间实践与空间想象存在差距。空间实践是个体通过感官形成的空间感知;空间想象是个体心中布局的空间映射,不依赖感官对空间赋予意义。政府在搬迁补偿安置动员工作中,为牧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生活的蓝图,将搬迁后的移民社区描绘成舒适和便捷的致富场所,激发了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搬迁后的现实情况与宣传的内容有所不同,牧民的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给牧民的生活带来了阻力。以锡林郭勒盟推崇的舍饲养牛模式为例,与传统的放牧形式相比,舍饲养牛属于精细化管理方式,工作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饲养技术。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与新邻居联络较少,同质性的想象和异质性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他们缺失群体认同感和空间认同感,使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感到焦虑并且产生了心理压力。

(二)国家权威视角下的空间实践

第一,空间实践中的新型经营主体。

易地扶贫搬迁的本意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环境承载力不足的问题,在改善原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关键环节,必然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牧民失去草场之后,原有的地方性知识在后移民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需要面对新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需要重新学习相关的生产经营技能以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搬

^①[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页。

^②李燕燕、刘志山:《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三重逻辑》,《湖湘论坛》2022年第2期。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①成为政府部门的关键任务。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社会变迁中需要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具有政府背景的专家知识系统通常是由政府建立并且提供支持、由各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知识体系决策系统。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专家知识系统对指导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各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方面,专家系统拥有深厚的专业素养、扎实的学科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降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生产经营方面的试错成本;另一方面,专家系统能够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在政府部门处理复杂问题时提出合理建议,通过易地搬迁将移民生产实践承载的“地方性知识”替代为“专家系统”,实现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余易达在博士学位论文《福柯的空间权力辩证法:语境、内容及意义》中认为:“知识的空间化是知识建构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因素”^②,这里的知识空间化指向对知识体系的建构。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对权威背景的专家知识系统提出了相应的见解,他认为知识作为权利的特殊机制,通过分层、监督和指导等形式,在被监督和被指导的过程中获得了权力效应^③。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生活空间的建构并非静止的和僵化的,而是通过向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传授知识来实现后续扶持,通过空间分配和专家实践指导的方式实现空间的治理。

笔者基于对锡林郭勒盟易地扶贫搬迁的考察发现,向接受搬迁的牧民提供生产技艺培训以及帮助他们提升能力,是专家知识系统替代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具象。政府和专家合作大力推广舍饲养牛模式,也说明权力和知识在新形势下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针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后续生产实践扶持,在特定的空间内,政府部门和专家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深刻影响着移民的空间实践;另一方面,专家传授的知识在牧民的生活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重新形塑移民的身体实践体系。

第二,空间实践下的社会治理。

内蒙古自治区在2001年出台的《关于实施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的意见》指出:“因地制宜、扎实有效地开展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移民工作,一方面可以减轻迁出区人口压力,使生态环境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通过迁入区人口不断向小城镇集中,从而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进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效农牧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带动二、三产业发展。”^④空间实践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是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强调在空间生产和管理的过程中保障移民生活空间向可持续方向发展。从空间生产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空间不仅是静态的物理容器,而且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进行政策引导和规范管理成为重要的治理议题。空间实践下的社会治理还应当考虑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多功能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草场经营方式由集体化经营向个体化经营转变,国家权威暂时从基层空间中抽离出来,国家给予基层更多的自主经营权,这意味着个人自主性增强,日益倾向于自己的判断,而非传统权威和集体的决策。牧民失去人民公社体制的保护,标志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需要国家重新入场,通过重新整合基层内部的社会空间的方式来打破原有社会空间的个体化特征,建立“框架内的国家”的生活空间组织样态。

易地扶贫搬迁只是第一步,使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新环境中稳定融入当地社会,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成功的关键。相关部门应当深刻认识单元精准化治理、认识空间差异化治理的时代优越性。空间差异化治理模式根据搬迁社区的具体情况,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社会治理策略。首先,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差异化治理,是为了应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风险和机遇带来的不确定性,因地制宜地采取多元化的应对策略,通过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模式降低不确定的社会环境带来的风险。其次,通过空

①任欢:《努力让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光明日报》2020年11月6日,第10版。

②余易达:《福柯的空间权力辩证法:语境、内容及意义》,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年,第54页。

③[法国]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2页。

④内蒙古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实施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的意见》,2001年7月1日,见 https://www.nmg.gov.cn/zwgf/zfgb/2001n_5184/200107/200107/t20010701_267601.html。

间的差异化治理来满足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基于政府背景的专家系统掌握的专业知识,推动现代农业和牧业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国家对基层的经济治理现代化。再次,空间的差异化治理有助于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空间资源不均衡问题。最后,空间的差异化治理可以降低市场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总而言之,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差异化治理,保证了党中央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预防和控制社会风险,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

四、空间实践中的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建构路径

(一)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制度框架内的移民生活空间生产

第一,空间的整合:顶层治理到地方治理的重构。

从对历史和现实的不断探索角度来看,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在人民公社解体后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基层社会面临着“悬浮”的挑战。政府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可以通过从生活空间抽离与再嵌入,增强社会管理模式,防范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地方人民政府将牧民集中安置到不同的标准化异质空间,实现精准、科学、分区管控。框架制度内的空间整合,意味着国家领导和干预基层空间的程度逐步加深。基层作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曾经以乡贤和地方领导为主体,联合血缘和地缘等熟人社群构成基层管理体系,继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随着基层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基层空间的同质性特征也有所改变,需要在原有空间形态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和调整。基层部门行政权力和制度的调整,改变了以往依靠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规范性、科层制的基层治理逐渐成为主流模式。政府的统一安排和制度执行,保证了党建和综合治理等各项职能工作的顺利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框架内的国家”向基层社会的再次下沉,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以易地搬迁工程作为空间治理整合的契机,实现了从顶层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方位重构。

第二,空间的支配:空间资本化的实施。

生活空间作为社会的容器,涵盖了日常生产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是权力、资本“以及社会力量各方社会互动行为”^①对移民生活空间施加后的产物。在国家权力、资本等力量的作用下重新组合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国家在移民生活空间的规划和管理方面不断适应新需求和新挑战的结果。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置是最有效的资源利用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优越性表现为灵活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存在市场失灵和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政府通常以宏观调控的手段辅助市场经济,以实现更加公平和高效的资源配置。目前,锡林郭勒盟地方人民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同推动扶贫项目的实施,施行差异化空间精准治理,在迁移地大力培育和扶持“舍饲养牛业”“生态旅游”“特色种植业”,实现政府部门与资本共谋发展,通过精准施策盘活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生产经营实践,促进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安置区商业资源的开发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在政府牵引下的空间资本化过程,以空间的生产、重组、控制的方式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这一过程涉及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居民、土地、房产、基础设施等资源的投入和开发运营,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对移民生活空间进行资本化运作,在实现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中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第三,空间的调整:从总体性治理到差异性治理的转变。

人民公社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既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也是基层管理单位,推行总体性的治理理念,以大包大揽的形式实现对资源的绝对垄断和总体性支配。随着牧区草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①潘泽泉、刘丽娟:《空间生产与重构:城市现代性与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学术研究》2019年第2期。

制的实施,牧民可以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对社会空间造成的影响是从总体性空间结构向个体空间结构过渡。这种过渡可能存在场域陌生化和风险承担个体化等隐患,导致社会失序和无序,构建新型空间治理体系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以县级以上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①从总体性到差异性的空间治理模式转变,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的进步、治理实践能力的提升、对复杂空间治理需求的积极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确性、有效性、公正性。政府在差异性空间治理方面,注重分工明确的空间规划体系,强调政策制定和定位实施,均应当考虑自然、经济、社会存在的差异。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需要根据地方实情灵活性调整空间规划,构建具有差异性的空间管理体系,以适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

(二)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移民生活空间建构的聚合与共生

第一,文化认知视域下的记忆和认同。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一书中认为:“自传记忆则是对我们在过去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这种记忆也可以起到加强参与者之间关系纽带的作用”^②。集体记忆由在相似文化熏陶下的特定群体组成,群体成员在参与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时,能够给出相似的回答,这种具有亲和力的相似性回忆源于相似的经历、事件、传统文化。群体意识的相似性和独特性建立在相似文化背景的日常生活世界,成员将集体记忆内化于身体之后形成特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而言,这种记忆往往通过口头传说、仪式、生活习惯等途径传承。在政府牵引下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虽然改变了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在空间格局发生变迁时,相似的民俗心理和相似的生活经历,使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难以在短时期内遗忘已经积累的文化连续性、民族历史叙述、物质文化遗产等,以“过日子”的生活策略传承民族集体记忆在社群中仍然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交往中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巩固文化基石,从主观意识方面勾勒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边界轮廓。

第二,“我们”与“他们”的结构边界形塑。

个体在社会中的实践行为并非机械的和无意识的,而是一个主动的和有意识的过程,依据自己的认知框架来解释社会现象并且予以反应。在生命历程中,“我们”的形式来源于归属的社会群体,个体倾向于根据所属群体来定义自己;“他们”是指群体内外成员的界限,即参照群体。“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社会情境对社会行动和社会行为进行反思性建构,从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社会历程中理解“我们”与“他们”。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一书中认为,不同民族常用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回答“我们是谁”,以某种象征物或者共同经历来标识自己^③,典型参照物包括民族、语言、共同的生活经历等,在比较过程中形成圈内“所属群体”的群体意识和圈外的“参照群体”。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通常携带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进入新的居住地,这些文化特征可能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继而形成“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总体而言,“我们”与“他们”(即“所属群体”和“参照群体”)是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社会化、个体能动、身份认同、社会融入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惯习对社会实践的指引。

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文化理论评论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实践感》(*Le sens pra-*

^①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年3月17日,见https://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

^②[法国]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③[美国]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tique)一书中将惯习(habitus)解释为:惯习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系统,行为倾向系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实践个体的行动,以实践感的形式获得实践主体对生活实践的感知和反应^①。惯习既反映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塑造,也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调整和适应的结果。生活空间作为区域性的、复杂的综合体,在一定的地理区间呈现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样态,能够深刻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认知、情感、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内化为个体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积累,通过行动来验证他们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实践中,惯习对个体的适应过程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携带自身的惯习进入新的社会环境,这些惯习包括语言、饮食、实践技艺等,他们在新环境中面临生活的挑战;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也需要依靠惯习的指导适应新的社会规范、工作方式、认知体系。这一过程可能伴随着身份认同的转变和对文化的认同,通过调整实践的形式,反身建构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边界。总之,惯习在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中发挥双重作用,既体现了个体应对新环境的挑战,也是文化遗产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设的重要资源。理解和尊重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惯习,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五、结束语:“空间实践—边界塑造”解释机制

人类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空间是人类得以开展实践行为的载体。空间和社会实践紧密关联,一方面,空间决定日常生活实践的基本样态;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实践对空间的形塑发挥着反身建构的作用。生活空间不是被结构化的、先验的、消极的概念体系,而是不断建构和再生产的文化产物,在空间实践的过程中以不断卷入建构和反身建构的方式,形塑着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边界。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是不断建构和再生产的文化产物,学界应当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建构实践逻辑的理解。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边界塑造在于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边界的建构逻辑既不是“政社合一”视域下国家对空间的强行驱动,也不是国家控制力的减弱导致空间趋向碎片化方向发展,而是基于“国家”与“移民”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合理区间实现双向建构。实现双向建构,既要认识到空间与政治等角度的紧密联系,也不应忽视空间生产的价值性、伦理性、自觉性关联,否则就会导致片面的空间决定论。

笔者基于对锡林郭勒盟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考察发现:首先,从“框架内的国家”的实践路径出发,在中国的制度框架内,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决定着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策略性选择和生产,而且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进行常规要素的约束。空间的根本属性决定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治理必须基于空间的属性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将国家权威置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生活空间,政府的影响力只有借助于专家知识和精准管控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专家运用知识(例如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培训生产技能、选择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安置地点等)指导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后续生产生活,实现社会治理;另一方面,通过空间分割的差异化管理模式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运用,确保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掌控以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其次,从“移民主体”的实践路径出发,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生活空间根据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行动意义而被反身建构。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新环境中建立自己的实践感,涉及心理适应、社会融入、身份认同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合自身的实践策略。移民主体虽然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但是能够依靠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结构,以“过日子”的行动逻辑形塑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边界。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心中“生活的世界”,在生命历程中积累并且灌输于实践者的思想,形成持久而稳定的行为倾向系统。这是一种持久的生成性原则,即使他们脱离曾经的情境和场域,个体的行为和认知也能够不同

^①[法国]皮埃尔·布迪厄著:《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的情境中保持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

总之,将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置于社会主义体制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考察,笔者发现,“国家”是无法回避的总体性因素。对“框架内的国家”(即政府)而言,通过空间治理对生活空间实施迁移调整,改变了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日常生活世界,以自上而下的路径塑造着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边界;对“移民实践主体”而言,生活空间的流变影响了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不断体验和感受新空间的过程中,重新关联和形塑日常生活世界的性质、内容、意义。在国家框架的边界内,行动者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情境,通过应用集体记忆、身份认同、惯习等行动策略,以自下而上的路径塑造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生活空间的边界,在此基础上促使政府相关部门根据获得的反馈以调整工作思路的形式对空间样态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功能转变。在“国家—社会”的互嵌之中,“政府”和“移民”以共同空间实践的方式影响着空间的界限,继而实现政策性移民生活空间的生产和后续完善。

Construction of Policy-Based Immigrant Living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actice: A Survey Based on Xilin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GUO Xud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state-societ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focusing on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bsequent suppor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underl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oundaries for policy-based immigrant living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 living spaces follows a two-way practice path involving “government-immigrant” interactions, where space is experienced through practices of construction and reflexivity. Both parties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in the process, shaping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mmigrant spaces. Within China’s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e state holds absolute discourse power, dominance, and control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 living spaces. Through spatial integration, domination, and adjustment, the state not only determines immigrants’ strategic choices regarding their living spaces but also provides necessary guidance for the routine elements of their daily lives. Although immigrants, as practitioners, occupy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position, they engage in practical behaviors informed by collective memory,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habitual practices. Guided by structural patterns of past activities, immigrants contribute from the bottom up to shap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living spaces. By situating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jects within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this study provides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 living spaces.

Key words: immigrant living space; spatial practice; “state-society”; boundary

[责任编辑 高宇]